

[英] M. I. 芬利 主编

张强 等 译

希腊的遗产

The Legacy of Greece

A New Appraisal

M. I. Finley



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主编

张 强 唐 均 赵沛林
宋继杰 翟 波 译



The Legacy of Greece

A New
Appraisal

M. I. Finley

希腊的 遗产

上海人民出版社

希腊的遗产

[英] M. I. 芬利 主编 张强等译

出品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马晓玲 李 颀

装帧设计：储 平

出品：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北京汇瑞嘉合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制版：北京大观世纪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开本：820×1280mm 1/32

印张：18.5 字数：368,000 插页：2

2016年1月第1版 2017年1月第2次印刷

定价：89.00元

ISBN: 978-7-208-13066-1 / K·2371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希腊的遗产/(英)芬利(Finley, M. I.)主编;张强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5

书名原文: The Legacy of Greece: A New Appraisal

ISBN 978-7-208-13066-1

I. ①希… II. ①芬… ②张… III. ①文化史—希腊
IV. ①K545.0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130230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 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目 录

推荐序 / 郭小凌 1

新版译序 7

译者序 8

前 言 13

第一章 引论 15

第二章 政治 40

第三章 政治理论 57

第四章 荷马与史诗 91

第五章 抒情诗及其他诗体 125

第六章 戏剧 164

第七章 历史与传记 212

第八章 教育与修辞 248

第九章 哲学 267

第十章 科学与数学 330

第十一章 神话 380

第十二章 希腊文化与犹太人 406

第十三章 希腊哲学与基督教 434

第十四章 建筑和城市规划 468

第十五章 造像艺术 494

第十六章 希腊的传统 521

译名对照表 571

推荐序

《希腊的遗产》和《罗马的遗产》是两本讨论古典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源流或承继关系的书。古典文明包括两个先后呈递的文明——古希腊文明和古罗马文明。书名《希腊的遗产》和《罗马的遗产》表明作者所属的 20 世纪后半叶的西方学人与 14 世纪以来的西方人一样，并没有因为现代世界的新说迭起、漫无定准，便拒绝承认自己是希腊罗马历史文化遗产的传人。¹

既然是继承人，就需厘清自己获得了哪些物质与精神文化资产，不能稀里糊涂地泛泛而论。为此，作者制订了辨识遗产的分类标准，把古代遗产细分成具有决定性影响、从属性影响和装饰性影响的三种类型。

1 《希腊的遗产》和《罗马的遗产》分别出版于 1981 年和 1992 年。部分现代西方学者对自身文明的起源有了新解，认为现代西方文明是近代新兴的文明，与古典关系不大。

所谓决定性影响就是没有甲就没有乙，古典文明的组成部分是其所影响对象产生的必要条件。比如没有古典哲学就没有近代哲学，没有古典建筑就没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不一而足。所谓从属性影响是指没有甲可以有乙，但甲对乙的形成提供了支持或有利于其完善，如西塞罗哲学或新斯多葛学派对启蒙时代英国社会政治思想的作用之类。装饰性影响则是修辞意义或比较意义上的作用，如现代演说中引用古典的格言成语，现代论述中援引古典的范例等等。

类似这种抽丝剥茧般地整理“家底”的著作，自文艺复兴以来便不断有人写过。为什么 20 世纪末叶的西方人还需要重新整理呢？《罗马的遗产》主编之一理查德·詹金斯对此做了解答：“时代似乎要求对二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研究”，¹ 他的意思是以往的整理已不能满足现代人的需求。所以两本书的封面语都特别强调这是一次“新的评估”（A New Appraisal）。至于新在哪里，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在阅读中得出自己的理解，至少在对罗马文明成就的估量上，新评估要比旧评估多了许多肯定。

阅读这两本书的读者或许会发现，作者把更多的注意力赋予了非物质文化遗产。遍布欧洲各地甚至西亚北非的不可移动文物以及收存于博物馆和私人收藏家手中的巨量可移动文物，在书中只占了很小一部分。在按门类列出的清单中，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仅在建筑与城市及形象艺术章节中得到了展现，其余约十之有八九的篇幅给了诗歌、音乐、戏剧、史学、哲学、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政治理论、教育与修辞、

1 见《罗马的遗产》“前言”。

科学与数学、神话、传统、语言、法律等非物质文化遗产。这可能和作者的价值取向有关。物质文化遗产主要给人以视觉触觉的感知，当然也触动人的心灵。但能够抵达西方文化灵魂深处的东西，更多的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我们把整个西方价值观比作层累的考古文化层，那希腊罗马的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看做是最底部的第一、二两层。这部分对西方人来说是奠基性或根本性的，构成了价值观的基础，其意义更为深远和重大。

对于缺少西方古代中古史知识的一般读者，有一点还需加以说明，就是古典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的源与流关系具有特殊性，和血脉相承的中华文明有所不同。打个比方，现代中华文明与古代中国文明之间是亲本关系，古典文明与现代西方文明之间则是嫁接关系。这一点颇值得玩味。

今天西方文明的主体民族，如盎格鲁-撒克逊人、高卢人或凯尔特人、日耳曼人、斯拉夫人等，在古典文明时期的希腊人和罗马人眼里，均属语言不通、文化低下的蛮族人、异族人。现代西文中的蛮族（barbarian）一词，最初在古希腊语中是一个拟声词 βάρβαροι，拉丁文对拼作 barbarous。它源于希腊人模拟异族陌生语言的发音“吧勒吧勒”（bar-bar），意指含糊不清的说话声。起初它的复数形式 βάρβαροι 是指希腊人对外族人（非希腊人）或不讲希腊语的人的一种没有褒贬意义的通称。公元前5世纪，希腊人在取得希波战争胜利之后，思想上开始产生政治、经济、文化的优越感，蛮族一词随之有了贬义。后来古罗马人征服地中海周边地区，接受了包括蛮夷概念在内的希腊文化。他们把自己和希腊人之外的异族人统称作蛮族。所以，在古希腊

和古罗马时代，现今西方文明的主体民族属于语言、宗教、习俗殊异的其他民族。虽然在罗马帝国中后期，北部的蛮族或多或少地被“罗马化”，但随着西罗马帝国灭亡，已经式微的古典文明也随之消亡，人本主义为主的古典书籍被封被毁被藏，希腊罗马文化在欧洲基本断了传人，取而代之的是神本主义的基督教文明，长达近千年之久。

后来资本主义兴起，西欧首先开始了社会转型的进程。新兴的资产者为了寻找批判现实的思想武器，从尘封的故纸堆中首先找出了古罗马文明，再顺藤摸瓜找出了古希腊文明，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所谓文艺复兴，就是复兴希腊罗马文化。及至启蒙时代，古希腊罗马著作已被西欧人奉为学习和模仿的经典，小学都要开设古希腊拉丁语课程。懂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以及熟读古典文献，是判断一个人学识教养程度的基本依据。我们读启蒙时代思想家们的著作，无论是哲学之父维科，还是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伏尔泰、卢梭、洛克等人的作品，古典文献不仅是他们的材料来源，而且是他们的思想源泉。譬如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不仅布局近似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而且不少论点与亚里士多德雷同。这种古典文明遗产为文化教育基本教材或读物的现象一直持续到20世纪初。所以那个时代的饱学之士即使未达到言必称希腊罗马的程度，却也八九不离十。古典文明的遗产就是这样与近现代西方文明紧密结合在了一起。

由此可见，近代西方人把古典文明作为自己的历史基础，完全是因古典文明适应近代西方的需要，从而引起他们主动选择或主动认亲的结果。在这种“嫁接”的过程中，同期的希腊人并没有参与，因为他们沦入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之下，被隔离于文艺复兴运动和启

蒙运动之外。因此现代希腊古典学的学术带头人，反而多是欧美高校培养出来的博士。这使历史充满了戏剧性。

还需指出，现代西方文明并非只有一个古典文明源头，它还有另一个来源即基督教文明，可谓“文化层三”。基督教原本从犹太教脱胎而来。倘若圣经《新约全书》可信的话，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时候，还是犹太教的一个小派别——拿撒勒派的精神与组织领袖，他并没有另组新教的雄心。但客观历史吊诡的是，当事人原想进这个房间，他的门徒却把他抬进了另一个房间。当然，基督教能够成为独立的宗教并广泛传播，还有赖于罗马帝国对地中海周边世界的统治和对基督教的接受与改造。这即是说，现代西方文明的根——古典文明加希伯来文明，对于今天西方文明的主体民族、亦即古希腊罗马人眼里的蛮族来说，都不是土生土长、一脉相传的文明，而是外来的文明。

顺便再说一句，古典文明是否还有自己的源头呢？这是西方学界一度热烈讨论的课题。1978年，美国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发表《东方主义》一书（中译为《东方学》），提出西方的自我中心论始自古希腊的荷马时代。他的这一解释带动了西方史学面对后殖民主义时代的现实问题而寻求古代解释的新方向。随后一些学者提出希腊东方化与东方化革命的命题，认为古典文明不是原生文明，而是深受近东文明影响的派生文明，大煞了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论的风景。其代表人物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教授伯纳尔。1987年起，他陆续发表《黑色雅典娜：古典文明的亚非之根》一书共三卷，认为古希腊文明源自古埃及与腓尼基文明，现代流行的古典文明系希腊人创造的说法出自18世纪以来西方学界制造的幻象。

时过境迁，东方化的观点虽然因证据不足未被西方学界普遍接受，但问题的提出至少引起人们对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和关联性的思考。

对于古典遗产，我们东方人虽不是继承人，却也不是瞧热闹的看客。我们在一定程度上通过近现代西方文明的传播也分享了这份遗产，比如拉丁字母和拼音文字、装饰性的建筑形式、西式舞台剧、奥运会、体育场馆、剧场等公共文化空间，当然还有受益良多的哲学、历史学、政治学、修辞学、逻辑学、文学、教育学、法学等学术思想。举个具体例子：我国医学院校的学生入学后通常要宣读希波克拉底的从医誓词。希波克拉底是古希腊人，西人称之为“医学之父”。他制订的医生职业道德规范纯粹是古希腊的回声，但在我们亚洲人心中也能引起共鸣。所以，这两本书的引进不只有助于读者更准确更深入地了解西方文明，还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自己。如果我国学人再进一步，像芬利等人一样，认真梳理一下我们继承的古代遗产，那一定是惠及现在和后世读者的善举。

是为序。

郭小凌

2015年7月7日于首博

新版译序

在译界，常说的一句话叫做“翻译是一门令人遗憾的艺术”。愚一直以为，所谓“遗憾”，更多的应该是译者在这种艺术实践中力有未逮所致。

在《希腊的遗产》第一版译序中我们谈到，“本书各章的作者均为西方古典学界的著名学者，对希腊遗产各个领域的研究均有着颇深的造诣”，故而“我们与学有专长的同仁分别承担本书的译事”。尽管如此，出版后我们还是翻检出诸多不尽如人意的移译，虑所不及者，则幸赖读书界指谬。

此番再版，我们得以对译稿进行较为全面的订正，但“遗憾”一定难免，尚祈学界同道继续赐教。

张强

识于2015年仲夏

译者序

在西方古典学界，除了这部由芬利主编的《希腊的遗产》以及理查德·詹金斯主编的《罗马的遗产》外，以“遗产”为题探讨希腊罗马文化的还出版过多种各具特色的学术著作，尽管内容有简有繁，论述方法上或就文化论文化，或旁及文化在历代传承中的意义，但均注意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希腊遗产与罗马遗产本身所提出的不同问题以及我们认识上的差异，其中之一便是如何理解、移译与希腊遗产密切相关的“hellenism”一词。

我们知道，自从德国历史学家J. G. 德罗伊森 1831 年首次提出“hellenism”的概念以来，由于其著述并未对这一从古希腊语推演而来的学术用语在时间与空间上予以明确的界定，致使西方学者在引用时多生歧义：有以“希腊语方言或结构”界说的；有翻译成“仿效希腊人”或“希腊化”的；也有解释为“希腊文化”或“希腊民族”的。

英国历史学家 A. J. 汤因比对这一概念前后亦有着不同的说解。¹ 翻译伊始，我们虽已注意到这种概念上的混用，并试图把“hellenism”一词统一移译为“希腊文化”，但在后来的通读中发现，本书在具体论述“希腊遗产在欧洲文化史上的意义”时，该词所蕴涵的并不仅仅止于“希腊文化”，在不同的章节中，在“希腊文化”这一大的概念之下还有着细微的差异，还另含有“希腊民族”之义。甫至书成，我们又不不得不根据不同的语境在“希腊文化”与“希腊民族”之间重新做出了适当的选择。

事实上，无论是“希腊文化”还是“希腊民族”，其本身所关心的无非是希腊人的界定问题，也就是说，希腊人是否曾作为分而自治的实体存在过？希腊人这一称谓是否指诸多不同社会的一个整体？针对“hellenism”一词的概念以及由此而引发的这些问题，芬利在本书的“引论”中把“希腊文化”以及创造此种文化的“希腊民族”合而观之，宏观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并在时间上予以明确界定。他认为，“hellenism”是一种抽象的概念，其本身所具有的多样性与创造力始于史前时代初期，历经四五个世纪的繁荣后衰落。继亚历山大之后，“hellenism”便成为遗产问题，并一直存在于它所滋养或产生的文化与社会内部，存在于罗马世界以及其他相关的文化之中。

“hellenism”作为遗产，一种芬利所强调的“双重意义”上的“存在”，接续而来的便是历代的继承问题，这也是本书作为新编的意义

1 参阅 Wolfgang Zeev Rubinsohn, “Hellenism in Recent Soviet Perspective”, in *East European History*, edited by Stanislav J. Kirschbaum, Slavica Publishers, Inc., 1988, p.41; Victor Ehrenberg, *Polis und Imperium*, Artemis, 1965, pp.41—49.

所在（见本书第一章）。博尔加在“希腊的传统”¹一章（见本书第十六章）中，对该遗产经罗马、早期基督教、中世纪早期的西部、拜占庭、阿拉伯文化、中世纪晚期的西部的传承以及文艺复兴时代的“复兴”逐一进行了描述，进一步阐明了希腊遗产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中的“存在”及其影响。这种“存在”或遗产，无论它是物质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历代均有着自己的选择，也就是说，有继承也有扬弃，“在几个世纪过程中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也就使得希腊在不同时期呈现出“不同的面貌”；但就整体上的西方文明而言，“hellenism”在被有意识地选择过程中虽然经历过所谓的“黑暗时代”，但其影响并未完全中断，至于文艺复兴时代所“复兴”的“不是对全部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因为其中大部分并未亡佚，更确切地说”，这种复兴“是对基督教传统在其开始时所排斥的那部分古典文化的重新发现”。要言之，希腊遗产的这种特征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如若在概念上对遗产与传统加以比较、区分的话，如若把“hellenism”在亚历山大之后的“存在”视为一种遗产的话，那么它对西方文明一以贯之的影响便可理解为一种传统，一种意识形态上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博尔加在“希腊的传统”一章中所概述的正是这种影响在文化上的延续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把该章的篇名移译为“希腊的传统”的原因所在。

荷马史诗作为西方文学史上的开山之作，“Ilias”与“Odysseia”这两部史诗的大题，中文通常根据英文中的“Iliad”与“Odyssey”

1 该章的英文篇名为“The Greek Legacy”，有别于本书的大题“The Legacy of Greece”。

音译为《伊利亚特》与《奥德赛》。我们知道，西方古典著作初无大题，亦无小题，从荷马的《伊利亚特》、《奥德赛》到赫西俄德的《神谱》、《田功农时》，再到希罗多德的《历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这些早期史诗与散文体史论的大题均为后人编订而成。校勘学上言之，西方古典著作大小题的出现盖始于亚历山大城图书馆建立之后，时在公元前3世纪。荷马史诗在古典时代作为开启青少年心智的教科书，“Ilias”与“Odysseia”的名目也许是出自雅典教书先生的笔下。¹ 中文若从英文把“Iliad”音译为《伊利亚特》尚可理解，但把“Odyssey”这一大题译为《奥德赛》、把诗中主人公“Odysseus”译为“奥德修斯”或“俄底修斯”便难以说解了，因为希腊文中的“Odysseia”系源自“Odysseus”。较为理想的翻译是把“Ilias”与“Odysseus”分别意译为《特洛伊的故事》与《奥德修斯记》。但是，考虑到荷马这两部史诗的大题在国内学界已广为袭用，我们在行文中权且保留了传统的译法，只是把《奥德赛》中的“Odysseus”也译作“奥德赛”，以求内容与大题的统一。

另外，本书中常见的人名、地名等专名，我们采用的是国内通行的译法；至于那些中文中不常见的，则根据古典语文的发音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译出。

除了上述翻译上的问题外，在这里还需一提的是，本书各章的作者均为西方古典学界的著名学者，对希腊遗产各个领域的研究均有着

1 Hesiod, *Theogony*, Edited with Prolegomena and Commentary by M. L. Wes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p.150.

颇深的造诣；如何翻译这样一部权威著作，如何较为准确地“传递”著者的观点，殊非易事，因为我们对西方古典文明的认识与了解不仅仅涉及西方现代语文，如英语、法语、德语，而且还涉及西方古典语文，如希腊语、拉丁语。东北师范大学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作为国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在从事世界文明史研究的过程中，尤为重视国外史学名著的译介（设有《世界文明史经典译丛》项目），强调古典语文的研习。作为中心的成员，我们与学有专长的同仁分别承担本书的译事，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较为准确地把握希腊遗产在各个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中的影响及其意义，但是，作为一种理想，我们是否真正做到了这一点，尚祈读者诸君有以教正，以匡不逮。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诸多师友的关注与支持。在此，特别要感谢世界文明史研究中心主任王晋新教授、徐家玲教授、郭春雨先生以及李晓东博士，承蒙他们在百忙之中拨冗阅正本书译稿的部分章节，并提出了很多宝贵的修改意见。让我们始终难以释怀的还有本书责任编辑孔令琴先生的耐心与信任。

最后需要说明的是，本书译文的通读工作由我承担，所有考虑不周、权衡失当之处亦由我负全责。

张 强

癸未年末 记于凯撒花园新居

前 言

由理查德·利文斯顿爵士主编的《希腊的遗产》出版于1921年，至今仍广为流传。倘若出版一种新编，更新信息不是唯一的原因，甚至不是主要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似乎是值得去尝试另外一种不同的研究方法。理查德爵士及其十位杰出的同仁撙节“遗产”一词之本义——先人的遗物，在以吉尔伯特·默里对“光荣属于希腊”的赞颂开篇之后，他们在宗教与哲学、艺术与建筑等各个领域对古代希腊文化逐一进行了描述。新编在保留这一原则的基础上（篇幅较之旧版多有缩减），继而在每一章中对后来几个世纪迄今人们从希腊人那里所继承的东西进行了探究。简言之，可以说旧版论述的是希腊文化，而新编关注的则是希腊遗产在欧洲文化史上的意义。

本书各章的论述重点及谋篇布局由论者自行选定。主编的介入不外乎限定各章的篇幅，注意避免论述的简单化以及史料的罗列，并删除过分的重复（不过为数不多的赘述在所难免）。除了要求考虑到遗产这一概念的双重意义外，我们对不同的观点并未强行协调一致。但在